

农户社会资本结构的变化促使了农村

资金互助组织的兴起吗？

——以江苏省为例

李 廷，任凡兴，李 明

【摘 要】：合作金融发展史表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产生于农村私人借贷市场，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存在增加了可供农户选择的借贷交易方式。本文从微观视角对农户借贷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和交易价格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农户借贷交易方式选择的决策模型，分析发现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是私人借贷市场借款成本上升和贷款收益下降的结果。本文进一步从农户社会资本视角分析私人借贷市场这一变迁的原因，并基于江苏省样本数据验证了农户社会资本中“强关系”的减少促使了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兴起。

【关键词】：农户社会资本，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交易费用，借贷市场

【中图分类号】：F83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70（2018）-07-0069（08）

【作 者】：李廷，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市 100872；任凡兴，中国农业银行资产管理部，北京市 100005；李明，副研究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成都 610072

一、引 言

近年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作为一种新型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于农村金融市场。目前受银监会监管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全国仅有十家左右，而分布于全国各地由农户自发成立并且不受银监会监管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却数以千计。据统计，仅江苏省乡镇或农村的资金互助组织多达四百多家，其中绝大多数分布于苏北或苏中地区，这类组织大多以民间团体的形式在当地民政部门登记而后受到县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的监督管理。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自发成立具有深层的社会背景，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众多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源于那些逐渐由贫穷向富裕过渡的农村地区，这类地区也是农村经济专业化程度逐渐增强、农村社会阶层开始分化、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地区，与此相伴随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传统农户所具有的亲缘关系正在淡化，这种社会变迁会不会是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兴起的原因？其中的机理是什么？这是本文旨在探究的问题。

关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产生、存在及发展的原因，已有研究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正规金融制度不适合农村金融制度需求，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应运而生。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具有典型的非正规金融特征，大量关于非正规金融在农村广泛存在原因的研究认为金融抑制政策的存在导致农村正规金融的缺失，非正规金融因而产生；^[1-4] 合会组织在上世纪 70 年代以前在台湾兴盛的原因是因为正式金融难以满足日益高涨的资金需求，80 年代后则主要是因为金融管制下的低利率政策不能满足资金投资收益要求；合会，作为农村金融互助合作组织，其出现和发展与现代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以及现代金融机构的匮乏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5] 正规金融机构难以支付具有吸引力的存款利率从而为合作金融的发展留下巨大市场空间；^[6] 胡建东认为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是现行的农村金融制度供给不能满足农村金融制度需求的产物。二是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相对于其他农村金融形式具有优势。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民间合作金融组织在缓解农户消费信贷的流动性约束、降低不确定性，以及降低信贷消费的违约

风险方面具有优势，并且证明即使农信社等正规金融机构不存在“借贷”，农户仍愿意参加合会而实现消费信贷的目的。^[7]将民间合作金融组织与民间私人借贷比较，夏小军指出，“会”不仅是一种信用关系，会脚们相互之间还有对资金的用途进行评议的权力，因此，风险低于两人之间的私人借贷。张翔认为合会贷款较个人单独向私人贷款具有信息汇聚优势，同时向私人借款在某些情况下较向合会组织借款可以降低搜寻成本，从而出现农村信贷市场中合会组织与个人间借贷相并存的现象。^[8]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产生是适应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结果，并且与合作思想的传播密不可分。^{[9][10]}

对于已有研究中强调正规金融制度供给不适应农村金融制度的需求是非正规金融或是合作金融存在原因的观点，本文认为此类观点并未明确“适应”的确切含义以及“适应”的条件，如果“适应”指正规金融满足全部的农村金融需求，非正规金融或是合作金融必然不会存在，因为任何一种金融制度能够满足金融需求就没有必要存在其他的金融制度；并且之所以有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分，就在于正规金融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无法满足农村金融需求，正规金融要“适应”农村金融需求需要冲破制度框架的束缚，实现制度创新，而当这种创新完成时，正规金融也必将烙上非正规金融的印记；并且美国等已经实现金融自由化的国家仍然存在非正规金融和合作金融，这表明金融抑制政策解释非正规金融和合作金融存在原因的观点同样不具有解释力。^[11]因此，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原因是其相对于正规金融和私人借贷具有某种优势，但由于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出现要远远早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出现，这说明正规金融组织不是合作金融组织产生的“土壤”。因此朱信凯和刘刚等研究农村合作金融相对于正规金融的优势难以说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产生及演变的逻辑。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产生发展的历史表明，资金互助组织由农村私人借贷市场演进而来，农村合作金融的产生应该是其相对于私人借贷存在优势。夏小军和张翔的研究对此分析具有借鉴意义。但张翔所提出的合作金融组织与私人借贷相比在“信息汇聚机制”方面存在优势的观点无法解释私人借贷市场中大量贷款人存在的现象。同时，张翔所强调的合作金融组织所具有的“信息汇聚机制”优势无法回答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产生晚于私人借贷的出现而后发展规模越来越大的原因。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微观“农户”视角对借贷市场中“借款人”和“贷款人”在借贷交易中发生的交易费用进行细分，构建农户在农村私人借贷市场和合作金融组织间借贷交易方式选择的决策模型。基于决策模型本文进一步分析农村私人借贷基础的变化及其对私人借贷市场中“借款人”成本和“贷款人”收益的影响，进而对农户在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和私人借贷市场之间的选择产生影响，以此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由私人借贷市场演进的一般逻辑和本质原因做出回答。

二、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演变逻辑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指出企业存在的原因在于市场运行存在成本，以企业家指挥资源配置的方式代替市场交易可以节约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市场交易没有完全被企业组织内部交易所替代，也说明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同样存在成本。他进一步用边际分析的方法指出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增加的企业内部边际管理费用与市场价格机制解决规模扩大所需要增加的边际交易费用相等。市场价格机制的交易费用包括：①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包括各种未获取和处理市场信息的费用，这是交易准备阶段的费用；②市场每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费用，这是交易活动进行时所发生的费用；③签订长期契约的不确定性引起未来可能的实施费用。^[12]在1991年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Coase将上述费用进一步总结为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即为“谈判、签约及履行合同的费用”。

本文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合作金融组织对于农户的主要功能是使农户拥有更多可供选择的借贷“交易方式”，这种“选择”的意义不是单纯体现为合作金融组织相对于私人借贷市场所具有的信息汇聚优势等，而是允许农户在每次借贷交易发生时可以在合作金融组织和私人借贷市场间选择最佳交易方式。考虑农户借贷的交易费用，所以不存在农户从合作金融组织或是私人借贷市场无法进行借贷交易的情况，即对于每次借贷交易农户均可以在合作金融组织或是私人借贷市场进行，只不过借贷的“实际”成本或是“实际”收益可能不同。借鉴科斯关于组织产生原因的观点，本文对农户分别“扮演”“借款人”或是“贷款人”时的交易费用和交易价格进行分析，并阐述农户选择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或留在私人借贷市场的决策机理。

依据已有研究对交易费用的分类，农户“扮演”“借款人”角色时的交易费用包括借贷交易发生前“搜寻”贷款人的费用

和借贷交易过程中的谈判费用（包括借款人向贷款人显示自身相关信息的费用以及讨价还价的费用）；当农户“扮演”“贷款人”时的交易费用包括农户搜寻借款人的费用，借贷交易过程中的谈判费用（包括贷款人识别借款人信息的费用和讨价还价的费用）以及借贷交易发生后“贷款人”对借款人监督的费用，农户在考虑以上交易费用的同时还要考虑交易价格（利率），并基于综合判断做出交易方式的选择。农户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可以获得在组织内部或是私人借贷市场发生借贷交易的选择权，这一选择权使得其在每次借款交易中实现成本最小化和每次贷款交易中获取最大化收益。同时因为加入合作金融组织存在“门槛”（首先要入股成为组织成员）和退出限制，面临一定的潜在“门槛”或退出限制的损失。而农户选择私人借贷时只能获取私人贷款交易中的收益和发生私人借款交易中的费用，但可以避免“门槛”和退出限制相关损失。在合作金融组织内部交易费用、交易价格以及“门槛”和退出限制相关费用既定的情况下，农户在合作金融组织内部的借款成本和贷款收益稳定。同时在货币政策稳定情况下，农户在正规金融的存款收益也保持稳定。一般而言，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实际存款利率高于正规金融机构，因此农户认为合作金融组织存款的收益和在正规金融机构存款的收益的差异取决于农户对合作金融组织管理者或是借款人的监督费用，而这种监督费用的大小必然与农户对合作金融组织经营风险的估计，事实上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一书“供应的行为”一卷中将风险大小与交易费用的高低联系起来，^[13]本文在此将监督费用的发生同样视为风险的存在具有类似的含义，如果风险不存在，贷款人也就没有监督的必要了。对于认为合作金融组织并不具有较正规金融机构明显较高的经营风险的农户，当其在私人借贷中贷款收益降低时，其加入合作金融组织的可能性更高并越倾向于在合作金融组织存款。当私人借贷市场中的借款成本升高时以至于合作金融组织中借款成本低于私人借贷市场中的借款成本，私人借贷市场中的农户选择加入合作金融组织可能性增大。

综上所述，私人借贷交易中的借款成本上升会使私人借贷市场中的农户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可能性提高；对于已经加入合作金融组织的农户而言，私人借贷交易借款成本的上升会使得其在需要借款时更倾向于选择向合作金融组织借款；私人借贷市场中贷款收益的降低，那些认为合作金融组织并不具有较正规金融机构更高的经营风险的农户较那些认为合作金融组织具有更高经营风险的农户加入合作金融组织的可能性更高；如果农户已经加入合作金融组织，对于那些认为合作金融组织具有更高的经营风险的农户，私人借贷交易中贷款收益的降低对其在合作金融组织中的贷款交易没有显著影响，而对于那些认为合作金融组织并不具有较正规金融机构更高的经营风险的农户，随着上述变化，其较那些认为合作金融组织具有更高经营风险的农户更倾向于将更多的贷款交易从私人借贷市场转向合作金融组织，于是合作金融组织由此产生并不断演变。现实中大量农村合作金融的出现及规模不断壮大表明私人借贷市场中贷款收益不断降低或是借款成本不断上升，为此，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农村私人借贷市场上某些农户的贷款收益为什么会降低？借款成本为什么会升高？

本文试图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所生存的环境—农村社会中寻求以上问题的答案，将农村私人借贷市场贷款收益和借款成本的变化与农村社会变迁相结合。已有研究表明农户社会资本对农户非正规借贷的交易成本具有重要影响，^{[14][15]}这为本文进一步的研究思路提供了借鉴。关于社会资本的定義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本文借鉴 Pierre Bourdieu 和 James S. Coleman 的观点将社会资本视为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16]根据程昆的观点，农户社会资本可以分为情感性作用发挥较大的“强关系”和情感性作用发挥较小的“弱关系”，“强关系”往往通过血缘和亲缘关系加以维系，“弱关系”更多依靠利益关系予以维持。在“强关系”的范围内，基于较强的情感联系比较容易达成借贷协议，这可以降低借贷双方的谈判费用和搜寻费用；同时贷方有比较强烈的帮助借方的意愿，以体现其对借方在情感上的重视，并期望获得借方的情感回馈，这可以降低贷款利率；同样借方也有比较强烈的按期还款的意愿，这使得贷方农户对借方农户的监督费用减少。本文进一步讨论，当借贷超越“强关系”范围时，拥有较多“强关系”的农户同样可以通过“强关系”这座“桥”在并不直接存在“强关系”的两个借贷主体间实现交易费用的节约。因此，“强关系”可以降低私人借贷交易过程借贷双方的交易费用，同时使得借方获得低成本的贷款，而贷方实现贷款的高收益（收获借方情感回馈）。然而随着农村社会变迁，农户社会资本发生变化。程昆对中国农村中农户社会资本的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发现农户社会资本中“强关系”减少，“弱关系”增加。关于这种强弱关系的变迁，加里·贝克尔在其《家庭论》中认为家庭成员之所以重视“亲缘”“血缘”关系是因为这种关系具有保障其抵御外部风险的功能，^[17]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变迁，市场规模的扩大，原本必须由“家庭”“家族”或是“亲缘”承担的功能逐步由市场所替代，于是“家庭”“家族”或是“亲缘”关系中有一部分成员间的联系就变得越来越没有必要，于是原有的“强关系”逐渐减少，而市场交易中逐渐建立起的“弱关系”会逐渐增多；因此“强弱关系”可能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农户自

身选择的结果，市场或其他组织之所以代替“家庭”“家族”或是“亲缘”是因为相关交易在市场或其他组织进行可以较“家庭”“家族”或是“亲缘”节约交易成本，农户基于所有相关的交易收益在减少“强关系”而增加“弱关系”和保持原有的“强关系”之间做出选择，而这种选择正是农户借贷交易方式选择的前提。与“强关系”相比，“弱关系”具有天然的松散性，并且通过“弱关系”搭建起来的“桥”终究还是“弱关系”。由于情感性作用发挥较小，借贷交易很难达成，借贷双方相互搜寻的费用和谈判费用较高；“弱关系”较“强关系”具有更强的不确定性，贷方农户需要耗费更多监督费用；同时“弱关系”范围内农户间交易的实利化倾向明显，贷款利率增高，借方农户的借款成本较高但贷方的贷款收益较低（贷款利率可能提高但情感收益减少）。基于前文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一：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社会资本中“强关系”越少，农户在私人借贷市场发生借款交易的借款成本可能越高，贷款交易的贷款收益越低，从而越倾向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反之，越倾向留在农村私人借贷市场。

假说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于认为合作金融组织较正规金融机构具有更高的经营风险的已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农户，社会资本中“强关系”变化对农户在合作金融组织中的贷款交易（存款）选择影响较弱；对于所有已加入合作金融组织的农户，农户的社会资本中“强关系”越少，农户在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进行借款交易的比例增加。

三、农户社会资本变化促使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兴起的实证分析

资金互助组织的自发演变必然是私人借贷市场借款成本上升或是贷款收益下降的结果，而私人借贷市场的这种变化可能与农户社会资本变化相关，本文实证研究农户社会资本的变化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演变的影响，以验证本文已有的模型分析。

1. 样本与数据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17 年对江苏省盐城市、徐州市、南京市、宿迁市共 36 家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及对互助组织所在地农户（包括入社农户和非入社农户）随机走访调研，农户包括农民资金互助社的社员和非社员，农户样本总数为 383 户，有效样本为 362 户，其中农民资金互助组织的社员 47 户，非社员 315 户，以上数据用于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户借贷交易方式选择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专门走访了互助社社员，获取的社员样本由 47 户扩展到 262 户，其中有效样本 244 户，这些数据用于探究社会资本对互助组织的社员借贷交易的影响。

2. 变量选择和定义

根据前文分析，农户社会资本变化对农户在合作金融组织和私人市场中贷款收益差异的影响与农户对合作金融组织经营风险的认识有关，为此，农户社会资本 SOCAPITAL 与农户对合作金融组织经营风险的认识 RISK 的交互项 SOCAPITAL•RISK 影响农户是否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 TYPE（虚拟变量，当农户加入合作金融组织时为 1，否则为 0）以及已加入合作金融组织的农户在组织中存款占农户总存款额的比例 CRERATIO；农户社会资本变量 SOCAPITAL 对农户在合作金融组织和私人借贷市场中的借款成本差异的影响与农户对合作金融组织经营风险的认识无关（农户在借款时没有必要关注组织的经营风险），因此仅农户社会资本 SOCAPITAL 影响农户是否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 TYPE（如果农户已加入则 TYPE=1，否则 TYPE=0）以及已加入合作金融组织的农户在组织中贷款占农户总贷款额的比例 DEBRATIO。同时农户家庭特征 HOCHAR，包括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万元）HOINCOM、户主受教育程度 OWEDU（虚拟变量，高中和中专及以上 OWEDU=1，高中及中专以下 OWEDU=0）、家庭政治资源 HOPLOT（农户家庭成员是否在政府、国有企业或是事业单位工作过或是近亲是否在政府任职，如果是 HOPLOT=1，否则 HOPLOT=0）；农民资金互助组织整体特征 ORGCHAR，包括互助社的存续年限 ORGAGE、互助组织规模（互助组织社员总数）ORGSCALE；当地农村金融经济特征 MACRO，包括当地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状况 FNUM，由于无法获取各个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只能用各类金融机构（包括农信社、农商行、村镇银行及从事地下金融活动的投资公司、咨询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的数量近似表示金融市场竞争程度，金融机构数量越多，近似说明当地金融市场竞争越激烈，还有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LOCALINC，用当地人均收入水平表示。农户家庭特征、

农民互助组织整体特征、当地农村金融经济特征均对农户借贷交易方式选择和已加入合作金融组织的农户在组织中借贷状况产生影响。

农户社会资本变量包含“强关系”量和“弱关系”量，本文采用农户因家族或近亲人情来往年均花费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来衡量“强关系”的量，采用农户因朋友或是远房亲戚人情来往年均消费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来衡量“弱关系”的量。本文假设“强关系”或是“弱关系”内部关系具有同质性，因此不再对其进行进一步细分。本文之所以采用人情费用占家庭收入比而不是费用绝对额来度量“强弱关系”，是因为“强弱关系”是农户一种“情感”的体现，在人情来往中穷人与富人等价值的花费却体现穷人较富人更多的情感，表明穷人更舍得也更重视人情来往。为此，“强弱关系”量的度量要考虑到农户财富的差异。本文对样本农户社会资本“强关系”量和“弱关系”量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发现“强关系”量和“弱关系”量相关程度高达 0.832，即“强关系”越多，农户“弱关系”也会越多；农户“强关系”越少，弱关系越少。这种现象与贝克尔关于家庭与市场及其他组织的“替代”关系的分析并不一致，这可能因为中国农村农户的“弱关系”主要通过“强关系”而非通过市场加以扩展，拥有庞大家族势力和亲缘关系的农户才更容易通过“强关系”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参加更多的生活娱乐活动等，并在此基础上获取更多的“弱关系”。农户“强弱关系”的高度正相关使本文仅需验证前文两个假说中“强关系”对农户借贷交易方式及合作金融组织成员借贷的影响，因此本文中农户社会资本变量 SOCAPITAL 仅指农户所拥有的“强关系”量。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对各个自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其中户主受教育水平与农户所拥有的政治资源、互助社存续年限与互助社的规模、互助社存续年限与当地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程度、互助社规模及互助社存续年限与当地人均收入、当地人均收入与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程度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但相关系数较小，这保证了以下实证分析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begin{aligned} \text{Logit (TYPE)} = & \beta_0 + \beta_1 \text{SOCAPITAL} \cdot \text{RISK} + \\ & \beta_2 \text{SOCAPITAL} + \kappa \text{HOCHAR} + \eta \text{ORGCHAR} + \\ & \pi \text{MACRO} + \epsilon \end{aligned} \tag{1}$$

$$\begin{aligned} \text{CRERATO} = & \beta_{01} + \beta_{11} \text{SOCAPITAL} \cdot \text{RISK} + \\ & \beta_{12} \text{SOCAPITAL} + \kappa_1 \text{HOCHAR}_0 + \eta_1 \text{ORGCHAR}_0 + \\ & \pi_1 \text{MACRO}_0 + \epsilon_1 \end{aligned} \tag{2}$$

$$\begin{aligned} \text{DEBRATIO} = & \beta_{02} + \beta_{12} \text{SOCAPITAL} + \\ & \kappa_2 \text{HOCHAR}_0 + \eta_2 \text{ORGCHAR}_0 + \pi_2 \text{MACRO}_0 + \epsilon_2 \end{aligned} \tag{3}$$

本文构建二元 Logit 模型探究农户社会资本对农户借贷交易方式选择的影响，如回归方程（1）；采用 OLS 回归探究农户社会资本对农民资金互助组织的社员存贷款额度的影响，如回归方程（2）和（3），各回归方程的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1 农户社会资本变化对农户借贷交易方式选择的影响

变量	回归方程（1）	回归方程（2）	回归方程（3）
SOCAPITAL•RISK	632.43* (368.51)	4.357* (2.654)	
SOCAPITAL	-576.45*	-0.801*	-0.474*

	(301.7)	(0.433)	(0.287)
HOINCOM	0.010 (0.384)	-0.002 (0.009)	0.017 (0.022)
OWEDU	1.843 (5.216)	-0.201 (0.187)	-0.561 (0.811)
HOPLOT	-0.409 (1.077)	0.085 (0.134)	-0.384 (0.272)
ORGAGE	4.935 (3.968)	0.047* (0.025)	0.053 (0.143)
ORGSCALE	0.006* (0.036)	4.71e-3 (0.001)	0.014 (0.031)
FNUM	0.079 (0.094)	0.000 (0.008)	0.006 (0.008)
LOCALINC	-0.003 (0.005)	-3.165e-4 (0.001)	1.907e-4 (0.003)
常数项	4.694 (11.110)	0.450*** (0.147)	0.537 (0.482)
调整 R ²	0.279	0.305	0.236

注：括号内数值表示相应系数的标准差，***、**、*分别表示统计值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方程（1）的回归结果验证了本文的第一个假说，即农户社会资本中“强关系”量的减少会使得农户更可能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这是因为农户社会资本中“强关系”减少必然会使得农户在私人借贷市场中借款成本上升，私人借贷市场中贷款收益不会减少，因此变量 SOCAPITAL 系数为正，这使得农户更愿意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同时社会资本中的“强关系”对农户贷款收益的影响取决于农户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风险认识，当农户认为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具有较其他正规金融机构显著更高的经营风险时，农户社会资本“强关系”的减少使得农户更倾向于在选择正规金融机构存款而非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加入合作金融组织不会增加农户贷款收益；而当农户认为合作金融组织具有与其他正规金融机构几乎相当的经营风险时，农户社会资本“强关系”的减少会使得农户更多选择与合作金融组织存款，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会增加农户贷款收益，农户社会资本对其“加入合作金融组织相对于留在私人借贷市场的贷款收益”的影响与农户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相对经营风险认识相关，交互项 SOCAPITAL•RISK 具有正的系数。同时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存续年限越长，规模越大，农户越倾向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这可能因为存续年限越长，规模越大，农户认为组织的经营风险越低。其他变量对农户借贷交易选择方式没有显著影响。

方程（2）的回归结果显示已加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农户社会资本的变化对其在合作金融组织中存款额度占全部存款的比例的影响与农户对合作金融组织经营风险的认识相关。对表 2 中 SOCAPITAL•RISK 和 SOCAPITAL 两项进行联合检验， $P=0.269$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对于认为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具有更高的经营风险的农户而言，随着其社会资本中“强关系”的减少，农户在合作金融组织中存款的比例并不发生变化；同时可以注意到，SOCAPITAL 的系数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对于那些认为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并不具有较正规金融组织更高的经营风险的入社农户，随着其社会资本中“强关系”的减少，其在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中的存款比例增大。合作金融经营年限越长，农户越倾向于选择与合作金融组织存款，这正如前文的分析，组织存续时间越长，农户认为组织的经营风险可能会越低，从而更多地选择与合作金融组织中存款。

从方程（3）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变量 SOCAPITAL 的系数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农户社会资本中“强关系”的减少会使得已经加入合作金融组织的农户更多地选择与合作金融组织而非农村私人借贷市场中借款，这验证了本文的分析假说。农户社会资本中“强关系”减少，农户借款成本上升，农户在合作金融组织中借款比例上升。其他变量对农户在合作金融组织中的借款比例没有显著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兴起具有深层次的农村社会变迁基础，随着农村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由“团结”到“分裂”，越来越多的农户所拥有的依靠“亲缘”和“血缘”维系的“强关系”逐渐减少，这种社会资本的变化对农户传统的私人借贷产生影响，农户在私人借贷市场中贷款收益不断下降，借款成本逐渐上升，这使得合作金融组织的成立变得必要，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规模“扩大”以替代原有的私人借贷市场成为一种趋势。

四、研究结论及展望

本文从微观农户视角解释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兴起的过程。研究发现，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产生和规模的不断扩大是因为农村私人借贷市场借款成本上升和贷款收益下降的结果，而农村私人借贷市场的这种变化与当前农村农户社会资本中“强关系”的减少有关。以江苏省农民资金互助组织为例，原有的农村私人借贷市场的相对优势正在逐渐下降，部分农户有加入合作金融组织并且在合作金融组织中进行借贷交易的需求，制度的内生性决定了制度的供给要适应制度的需求，农村“社会精英”在迎合农户需求的情况下成立合作金融组织，并随着新的农户加入以及农户在组织中借贷交易量的增加，合作金融组织的规模不断扩大。

本文以农村私人借贷市场为切入点分析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产生及演变，建立一种新的金融交易方式需要成本，任何一种金融交易方式的产生都源于其“前一种金融交易方式”借款成本的增加和贷款收益的减少，当成本的增加或收益的减少超过建立一种新的交易方式所需要的成本时，新的金融交易方式便会产生。联想到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金融市场退出的事实，大多研究均从商业银行视角研究正规金融在中国农村难以有所作为的原因，但本文认为从农户自身视角，在考虑存在交易成本的真实世界里，农户之所以不向或是不能从正规金融借款是因为农户在正规金融机构借款中具有较非正规金融更高的借款成本，而非正规金融机构这种相对借款成本优势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也必然会发生改变，如果非正规金融市场借款成本上升到与正规金融市场借款成本相当的水平，正规金融机构便可以再次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正规金融机构的“重返”便是很好的例证。

农户社会资本变化隶属于农村社会变迁的范畴，农户借款成本及贷款收益的变化必然是农村社会变迁的结果，剖析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变迁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对农村私人借贷、合作金融及正规金融制度变迁的影响，进而从农村社会变迁视角解释中国农村金融制度演进的一般规律是一个既具有研究意义又具有政策价值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雷蒙德·W·戈登史密斯. 金融结构与发展[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2]张杰. 中国体制外增长中的金融安排[J]. 经济学家, 1999, (02).

[3]张军. 改革后中国农村的非正规金融部门: 温州案例[J].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 1997, (03).

[4]史晋川等. 制度扭曲环境中的金融安排: 温州案例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1, (01).

[5]单强等. 论近代江南农村的“合会”[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2, (04).

[6]贺力平. 合作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 管理世界, 2002, (01).

-
- [7]朱信凯等. 二元金融体制与农户消费信贷选择——对合会的解释与分析[J]. 经济研究, 2009, (02) .
- [8]张翔. 合会的信息汇聚机制——来自温州和台州等地区的初步证据[J]. 社会学研究, 2006, (04) .
- [9]夏英等. 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础的资金互助制度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10, (04) .
- [10]卢敏等. 农民资金互助社的成因、运行与发展困境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12, (03) .
- [11]林毅夫等. 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J]. 经济研究, 2005, (07) .
- [12]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a, 1937, (04) .
- [13]张五常. 经济解释卷二：供应的行为（神州增订版）[M].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0.
- [14]程昆等. 农村社会资本的特性、变化及其对农村非正规金融运行的影响[J]. 农业经济问题, 2006, (06) .
- [15]钱水土等. 社会资本、非正规金融与产业集群发展——浙江经验研究[J]. 金融研究, 2009, (11) .
- [16]Bourdieu , P .J .S .Coleman .Social theory for a changing society[M].Boulder : Westview Press, 1991.
- [17]加里·斯坦利·贝克尔著. 家庭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